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 城市棱镜中的 空间与叙事

曹云雯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 城市棱镜中的空间与叙事

曹云雯◎主编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棱镜中的空间与叙事 / 曹云雯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7.9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 郭建斌主编)

ISBN 978-7-105-15031-1

I. ①城… II. ①曹… III. ①城市社会学—昆明—文集 IV. ①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4183号

## 城市棱镜中的空间与叙事

---

策划编辑 彭素娥  
责任编辑 李燕妮  
装帧设计 刘海伦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30千字  
印 张 15.375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5031-1/C·397(汉317)

---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58130104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创新团队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社科）”资助

##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郭建斌

副主编 杨绍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亚南 韦 平 孙信茹 杨绍军 杨星星 张静红

陈静静 金晓聚 单晓红 徐明卿 郭建斌 曹云雯

## 文丛总序

自1997年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以来，就把“民族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当时这样一个方向的确立，并非我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未来有某种“先知先觉”，而是和云南大学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重点密切相关。民族学是那个时候云南大学文科学科发展的重点，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少非民族学的学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民族学靠近。

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是1984年设置的，1985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就在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这与云南大学新闻专业的第一任教研室主任高宁远有着直接的关系。高宁远老师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来到云南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2006年7月22日去世。1994年底，高宁远出版了《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一书，从该书的内容框架来看，它已经与同时代国内出版的新闻学理论的教科书有较大的区别，书中出现了很多传播学的概念，如“信息”“传者”“受众”等。讲这方面的情况，并非要去强调云南大学新闻系传播研究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讲在传播学进入中国不久，作为这样一所边疆大学

一个新办的新闻学专业，与传播学相关的内容在教学、教材中就有了具体体现。

恰巧就是在云南大学新闻系单独建系的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升格为一级学科。那个时期，就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来看，主要还处于译介阶段，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所开展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建系之初，我们所开展的第一项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这项研究属于传播研究中的“发展传播学”的范畴，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研究得到了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的资助。项目于1998年底立项，1999年全年都在调研，2000年成果出版。这样一个匆匆完成的项目，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这项研究也算是当时国内立足于本土所做的一项规模较大的实证研究。

这样一项研究，无疑是和云南大学新闻系当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相吻合的，但是，在实施这个课题研究时，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传播”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借用，并未在学理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量化研究的方法、理解和运用都还不是十分熟练。现在来看，这样一项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走出校门，关注社会，关注云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同仁在研究方向上和此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研究取

向上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人类学的民族志。2001年，后来成为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的孙信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入选2002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研究生论坛”，并在论坛上获得好评。2003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郭建斌在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个用民族志的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据我们了解，当时国内也有一些西部地区的高校把“民族传播”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方向，但是在当时，在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之下明确地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被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认可的，似乎还没有。

2009年8月，云南大学新闻系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建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恰逢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云南大学举行。虽然研究所的成立与这一学术盛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是这样一项国际学术会议的一项内容，但是在内在逻辑上，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当年就得到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项目资助，在此项目的基础上，相关的课题又在201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样两个研究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再次把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学术

力量凝聚在一起，如同1999年开展的项目研究一样，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成立之后，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着手国内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的翻译工作，译者也主要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该译丛至今已经出版3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所以想到翻译这样一批“媒体人类学”的著作，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西方“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和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之间有很多的关联，而国内人类学界对此关注的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想通过这样一套译丛的翻译、出版，给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学生提供某种借鉴。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云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开设传播学课程，到1999年开展第一项具体的实证研究，再到本世纪以来转向人类学方向，最后有了一个具体的学术平台。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的讨论，最后落实到了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具体方向——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是有研究成果支撑的。除了以前产生的学术成果之外，现在我们又有机会以“研究文丛”的形式来展示我们的学术成果。

这个“文丛”所收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近年来较新的研究成果，共5本。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又分项目成果和博士学位论文两类。就项目成果而言，包括前面说到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资助的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



关的项目成果还有其他的，在这里只收录了2本。3本来自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篇与前面说到的项目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在云南大学在职攻读艺术人类学博士学位。另外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作者在来云南大学之前完成的，在原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另一篇的作者是云南大学教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尤其是后两篇博士学位论文，看起来似乎和研究所的研究路径不大相同，一篇关于美国电视剧的文本研究，一篇是关于英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丰富了我们原来的内容和视角，并且较好地体现了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第二类是从云南大学传播学硕士点十多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挑选出来的，这些论文虽然谈不上完美，但在我们看来都是做得不错的论文，并且，这些论文与云南大学新闻系自1997年以来确立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以及后来的研究所力主的研究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云南大学自2000年底获准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于2002年招收第一届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民族与传播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虽然后来学位点增加，学位点层次也得到了提升，但是“民族与传播研究”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这里收录的硕士学位论文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并且有些论文是在几年前完成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这样一些在我们看来不错的论文集结出版，或许能够给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们提供一种借鉴；或许还谈不上借鉴，那就

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吧！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在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上，我们几乎没有学科、专业的界限，而是围绕研究问题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我们希望与国内外学术界、业界的同仁开展广泛的交流，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这个“文丛”能够得到各位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郭建斌（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2015年2月24日于昆明

# 目 录

- 编者导言 拉斯韦尔传播观念及其理论信念的解读  
曹云雯 / 1
- 有关城市：现代性叙事与“城中村”女性  
曾真 / 27
- 外国人在昆明人际交往调查研究  
陈雪 / 121
- 花妞秒杀：网络购物新时空  
宋洁 / 214
- “流动儿童新闻杂志项目”赋权实践的叙事探究  
高琳 / 325
- 媒介之城  
——昆明城市空间分析  
高莉莎 / 397

# 编者导言

## 拉斯韦尔传播观念及其 理论信念的解读

曹云雯

三十年来,尽管传播学科的“知识地图”在不断延展,优秀的译著和教材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传承功能,但在中国内地,“传播学概论”的影响力依然强劲,“化简式学科叙述”的支配地位不易撼动。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哪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谓“高涨期”,迅速增设的教学点,尤其是研究生的扩招,促使传播学书籍拥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知识的功利化倾向明显。然而,知识生产与大学的专业化发展密不可分,哈里曼先生说:“学科规范知识是由空间化过程生产的:即就是说,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将社会现实想象为一组相续的空间,它们由不同的论述描述出来,并由观察维系着。”<sup>①</sup>就

---

<sup>①</sup> 转引自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载《现代传播》(双月刊),2005(2)。

此而言，中国传播学在大学的专业化与空间化过程生产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符合学科规范值得怀疑。在“拿来就用”的风气下，作为知识传播的“中继站”，教师所创建的“局部语境”究竟对学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成为一个问题。

考察知识传播的社会过程，一个典型案例是对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理解。本文拟通过对拉斯韦尔代表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的文本细读来梳理其传播观念，其间参考相关史料和拉斯韦尔的汉译论著，尽量避免以思想阵营的划分来推论。我认为，细读文本可以知道：第一，《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并没有提出“5W模式”，而是提醒传播学研究者，这个问题框架尽管实用但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第二，“生物界的对应现象”是一个有限论据而不是一般的修辞手段，这个类比解释了信息传导的复杂结构和“传播的三种功能”的应然性和显然性。第三，影响有效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注意结构的对应，限定条件是权势对环境的操纵，后者扭曲了社会传播，成为决定传播结构及其功能的关键因素。第四，拉斯韦尔是一位实证精神和理论信念兼具的学者，其传播观念建立在他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精微观察和对人类命运的长远关怀之上。他因追求理性而具有学术良知，思想丰富深厚，值得后学读解。

本文分为“模式及其五个问题”“政治学家的视野及其有限论据”“有效的传播及其限定条件”和“不完美的理想及其他”四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回应论文集的作者



和潜在的读者，一些思考与诸君共勉。

## 一、模式及其五个问题

作为传播理论中最流行的措辞，“5W”频频出现在学科语境中，很大程度上既充当着“传播学是什么”的诠释者角色，又作为一个“最初始”的传递模式被品评和“超越”。<sup>①</sup>一般而言，学界基本上将拉斯韦尔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作为该模式提出的标志性文献。诸如此类的判断太普遍，恕不举例。在我看来，罗杰斯的表述最为独特且颇具深意：“不过，大部分传播学学者只是因为一句话就知道了他，这句话将传播领域描绘为：‘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sup>②</sup>的确是“一句话”。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拉斯韦尔在此文中表述了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但不能倒过来说“《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总结或提出了5W模式”。拉斯韦尔用5000多个英文词语、分13节阐述的仅仅是一个模式吗？当然不是！其实，早在1932年拉斯韦尔就提出过“4W”（谁？说什么？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7年之后，

<sup>①</sup> 多数批评的观点认为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是线性的、单向的，忽略了“反馈”。

<sup>②</sup>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177~17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众传播研讨班上他增加了第5个“W”（通过什么渠道？），由此，经典模式迅速流传开来并成为研讨班的基本框架。<sup>①</sup>是的，刚好是五个“W”。

套用“五个问题”的结构解读1948年的文章，第一就要问作者是谁。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但重点在于撰写和发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前后，因为研究取向不合乎主流，拉斯韦尔被美国政治学界封冻，从1937年到1950年，十多年间，他没有在任何一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此间，他也经历了中年危机，1938年，在取得终身副教授的境况下他从芝加哥大学辞职去华盛顿一个研究所发展，度过了8年的边缘生活，于1946年在耶鲁法学院安定下来。<sup>②</sup>这个时期的拉斯韦尔与洛克菲勒研讨班时的他甚或1927年前的他是相同主体吗？<sup>③</sup>新话语的问世证明了陈述行为的产生，也证明了主体的迁移。跨越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的拉斯韦尔，跨越了学界排斥、计划落空并因所有个人物件、文章和资料在车祸中被全部烧毁，必须跨越思想记录悬崖式断裂的拉斯韦尔，开始了新的征途。可见，1948年的这篇文章是特别的，

<sup>①</sup> 参见熊澄宇：《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3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sup>②</sup> 参见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181~19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sup>③</sup> 1926年，拉斯韦尔24岁时完成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成书出版。

它的陈述者在重构思想。如何证明?“其义自见”!

拉斯韦尔开宗明义：“描述一个传播行为的方式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回答以下的问题：……”<sup>①</sup>他强调，研究者在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分析等向面对某个传播行为按传播环节所做的问题回应，不仅割裂了实际上的传播过程，而且这种区分的有效性还受制于研究方案与科学目标与管理目标的协调与适应。换言之，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因研究的目的不同，根据科学的逻辑和行政的逻辑对其传播过程的切分是不一致的，他用受众分析与效果分析的合并以及内容分析对要旨分析和风格分析的进一步区分为例证明了这种不确定性。因此，拉斯韦尔并非在总结或提出一个所谓的模式，而是在质疑一个看似有利于研究实践的问题框架所存在的科学风险，尽管这个框架一度备受青睐，开辟美国传播研究的基本路径，为作者获得了声名。但是，很明显，拉斯韦尔要与之分道扬镳。<sup>②</sup>

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随即被提出来了——“说什

<sup>①</sup> 哈德罗·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第1节，“传播行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本文未加注释的引语均来自此译本。后同。

<sup>②</sup> “更详细阐述这5个范畴固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本文所论者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范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切分传播行为，而是将其视为与整个社会过程相关的一个整体。”（见《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第2节，“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么？”和“对谁说？”文章标题非常明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他很肯定地提出，任何传播过程都可以用“结构”和“功能”两个参考框架来考察。这是全文的核心观点，作为结论置于第2节，并将 Structure and Function 列为此节标题。这个看似与全书标题有重合的措辞其要义在于相对于前述的那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切分框架，作者拟提出一个新的、可靠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的主要特点是不对一个传播行为进行任意切分，而是强调“传播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整体吻合，从传播的角度考察社会过程或还原社会过程才是重点。谁是这个观点的潜在论辩者？自然是对传播行为轻车熟路地进行切分研究以满足不同研究需求的专家们。据说，此文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广泛赞誉”，被学界认为是“一部传播学的独立宣言”<sup>①</sup>。其实，仅从此文提出了一个与之前盛行的研究框架完全不同的新框架的角度来看，不难想象其轰动效应，尽管我们无法体验其社会语境。也正因此，批评拉斯韦尔模式的话说出之前既要慎重，也不要一味膜拜，因为，从社会过程的整体性来看，拉斯韦尔的新框架究竟“取得什么效果”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需

<sup>①</sup> 参见熊澄宇：《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3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